



中國教育發展與改革

周祝瑛／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一、歷史背景

中國現代教育始於清末（二十世紀初）廢科舉、設學堂，建立現代學制，過程中融合了傳統文化、國外的思想制度移植，與本身教育轉折的變遷經驗。民國成立後（1911年），中國新式教育（當時稱為新學或新教育）的起源與發展有很相當大的因素是為了與過去中華文化的傳統有所區別，如：五四運動時強調新文化運動，主張「打倒孔家店」，提出反對舊教育、舊文學與傳統文化等行動，所以在整個中國現代教育建立的過程中，大都刻意與傳統文化與舊制度保持距離。儘管從清末到民初，甚至後來的國民政府時期，都在強調「中體西用」，而胡適、杜威等的文化教育思想也不斷交錯影響著近代中國，許多當時的教育革新構想與方案也大多移植自外國，因而常出現無法適應中國現狀和需求的情況。尤其大多西方新式教育侷限於沿海地區和大城市中，很少能推展至其他地區，至於邊遠地區與一般農村則仍保有傳統的教育觀念與維持老式作法，例如：尊重知識、崇尚讀書人的儒家傳統觀念尚未改變；民間辦學、私人辦學的傳統也依然存在（費正清，1994）。

至於在陝甘邊區等地（為中共發源與流亡老革命區，又名老解放區）受到蘇聯勢力的影響，逐漸發展出有別於沿海或傳統士大夫的社會觀念。當時在廣大的文盲農民社會中，中共等人士強調平民與鄉村教育運動（如：梁漱溟、晏陽初與陶行知等），崇尚法國的勤工儉學與蘇聯反資本主義，重視工農階級生活的思想改造工作，可說是另一種西化的探索過程。尤其一九四九年後國民政府自大陸撤退，中共接收大陸、建立政權後，在1949年12月召開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指出新中國教育根據一下來源：

「以老解放區教育經驗為基礎，吸收舊教育某些有用的經驗，特別要借助於蘇聯教育建設的先進經驗」（汪學文，民68）。

中國大陸後來的許多教育措施，如：重視社會主義意識型態、強調政治與勞動相結合教育、實行黨對學校的領導，報考大學時個人身家與政治調查、免費上大學、大學畢業後分配工作、甚至一九五零年代推動小學五年一貫制等實驗，都可說是延續陝甘邊區的教育經驗。

另外，當時全面學習蘇聯模式¹，強調教育理論要承繼馬克斯主義思想，主張教育是上層建築的一部分，是經濟基礎的反映，教

¹ 鑑於一九二〇年代蘇聯教育改革受到杜威實用主義的影響，學生在校中無法學到系統的知識與能力。於是一九三〇年代重新進行全面中小學教育的改革和調整，強調學科中心、課堂中心、與教師中心等理念，反對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也提出教育是上層建設，是經濟基礎的反映，階級社會的教育具有歷史性、階級性；教育是要為無產階級服務的事業。另外引進了「教育」、「教學」、「教養」等三個概念。凱洛夫在《教育學》的第一章第一節，論述了各個社會形態的教育以後指出：「教育總是和政治相聯繫著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必然要消滅阻礙社會向前發展的資產階級的階級教育，而以共產主義教育來代替它。」蘇聯凱洛夫教育理論體系可謂影響了中國教育理論達半個世紀之久。



育需遵照階級性和黨性原則，尤其強調蘇維埃教育是要為無產階級服務的事業。在培養具有共產主義社會公民特性時，也需重視專業系統知識的傳授，稱教師為園丁，強調教師在教學中思想行為的主導作用（顧明遠，2004）。於是在一九五〇年代初頒布「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綱領」中，重申新中國的教育是具有「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特色，採取高度中央集權制，學校中以政治教育取代道德教化、與人格養成，需結合國家的利益與價值，反對一切人文主義（包括宗教）的教育內涵，強調教育的工具性與技術性導向（杜作潤，1999）。當時大量模仿蘇聯的教育經驗，建立蘇聯模式學校、積極翻譯教育理論、著作和教材，邀請蘇聯專家擔任教育部與大學顧問，重視科學與專業技術人員的培養、及派遣留學生到蘇聯學習等（杜作潤，1999；顧明遠，2004）。

同時隨著中共全面推展社會主義革命，儒家等傳統文化再度受到嚴厲批判，包括民國初年從西方傳入的新式教育，都視為是具有封建餘毒的舊傳統，而需極力予以消除，甚至連當時各種私立學校都紛紛收歸國有，禁止任何資本主義或私人企業的存在。儘管一九五〇年代以後，中國的教育路線曾多次出現「紅與專」路線之爭（即強調革命運動或專業素養何者為重？）（Hawkins, 1984），不過大多時候仍以毛澤東的反對智育與考試至上、反對理論脫離實際、反對制度化、與反正規化教育等思想為主流；尤其毛本人擅長煽動民粹主義（如：發動各種群眾運動、甚至進行革命武裝鬥爭），經常將教育高度政治化，用政治批判和群眾運動來挑戰教育，最後造成十年文化大革命（1966-76）中全面教育中斷等嚴重後果（汪學文，民68；周祝瑛，1988）。

一直到一九七六年文革結束後恢復高考

制度（大學聯考），重新形成了新的考試主義與學歷文憑主義，傳統中考試領導教學（應試教育）的升學主義情形再度盛行。此種升學競爭在一九八〇年代被稱為「片追」（片面追求升學率），一九九〇年代被稱為「應試教育」，可見升學壓力始終難以去除。為此一九九〇年代，中國政府重新提出以為追求素質教育（均衡發展教育）為重心的教育改革行動，決心減除學生壓力。至於消失已久的私人興學也在新的經濟改革中，重新在一九九〇年代中期恢復。總之，近十多年來中國的教育改革，基本上維持著過去以教育促進中國現代化的目標，深具教育工具性實用思想。

總之，在中國教育現代化的過程中，二十世紀上半期學習及引進日本、德、法與美國等教育模式；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大陸的教育發展，除了繼承了中國部分傳統與陝甘經驗外，還深受蘇聯教育的影響（相對台灣則學習美國為主）為主。

到了一九九〇年以後的改革開放，則試圖脫離蘇聯模式，學習西方歐美經驗（杜作潤，1999；Hayhoe, 1989）。

二、教育制度

由於近代中國長期的戰爭，加上許多社會不利因素使然，中國大陸到了1949年時，文盲人口仍高達90%。為此中共開始把掃除文盲視為優先的發展重點，主張「教育須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培養德、智、體等方面、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汪學文，民68），訂定為各級各類學校的教育方針。當時中共當局也體認到借鑒外國教育經驗時，必須考慮到中國的實際社會需求與狀況，不能直接抄襲別國經驗與模式，因此強調要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教育理論和教育制度（吳文侃、楊漢清，1999）。



整體而言，中國大陸的教育充滿了各種實驗性，且經常朝縮短學校年限的目標邁進。例如自1949年後，大陸的學校制度就已歷經七次變革，目前是以「六三三四制」及「五四三四制」為主。到了一九八六年才開始實施九年義務教育，為了因地制宜，將全國分成三大區域、分期推動。歷年來學制變化主要的特色在於（程介明，1992）：

- （一）受到政治與經濟因素的影響甚鉅，教育改革試驗多。
- （二）學制變化大，儘量縮短學習年限；正規（普通）與成人教育並行（俗稱「兩條腿走路」），全力掃除文盲。
- （三）教育行政體制調整迅速，教育主管部門常隨不同的時期而有變化，中央一級原名「教育部」或「國家教育委員會」，國務院所屬部委亦設有「教育司（廳）」；省一級設「教育廳」或「教育委員會」；與省同級的自治區、直轄市也設「教育局」；縣級則設「教育局」或「教育委員會」。
- （四）教育規模大，各級學校數與學生數都非常龐大。

茲就一九四九年以來大陸教育的發展簡述如下（周祝瑛，2002；楊景堯，1998b；范利民，1996；王瑞琦，1994）：

（一）文革前（1949～1965年）

此時期又可分成三個階段：

1. 蘇化階段（1949～57年）

此階段主要是向蘇聯一邊倒，強調學習蘇聯經驗，接收私立院校及三次大規模的校、院、系調整，在各級教育內容和學習方法體制上，均採蘇聯經驗。

2. 大躍進階段（1958～60上半年）

由於當時中蘇關係交惡，加上學習蘇聯

經驗與中國實際問題結合有困難，因此興起了全黨全民辦學運動，實行教育大躍進，教育上也從「蘇化的教育政策」，轉為「毛澤東主義的教育政策」，建立黨委領導制（以黨領校），成立校辦工廠及正規與業餘教育並進的「兩條腿走路」制度。

3. 調整階段（1960年下半年～65年）

有鑑於上個階段所造成的經濟衰退與教育問題，此時期由劉少奇接任國家主席，提出修正主義路線，以「提高、充實、鞏固、調整」為方針，重視教育質量的提升。

（二）文革時期（1966～1967年）

由於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提出以無產階級掛帥的群眾路線口號，試圖建立毛澤東思想學校。例如在高等教育上，首先廢除高考制度，改採「推薦與選拔結合」的辦法，停止招收研究生，並大量裁撤、合併與搬遷各種高校。結果造成一九七六年全大陸大學畢業生只剩103萬3千人，其中67萬是一九六五年以前入學的大學生。

（三）文革後迄今（1977年～迄今）

文革後進行以下幾個階段的改革：

1. 撥亂、反正、試探、調整階段（1977～1984年）

此時期為了整頓文革後的問題，配合四個現代化，中國大陸重新採用了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等方針，來加強教育的提升，希望從中國社會主義為出發點，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教育體系。

2. 規範方向、體制改革階段（1985～1989年上半年）：

為了配合經濟體制的改革，在一九八五年通過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此時期希望以穩定的規模、良好的結構、徹底的改革以提高教育的質量，達成大量培育優秀人才

² 四個現代化以及三個面向

中國四個現代化：農業、工業、國防、科學技術四個方面全面的現代化。

三個面向：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



的目的，以符合四個現代化以及三個面向的要求²。

3.治理、整頓、緊縮、昇華階段（1989年下半～1992年）：

由於一九八九年七月發生天安門事件，同年下半年高等教育全面緊縮，出現了減少高校招生人數，調整科系專業結構，實施社會實踐活動等。高等教育重新受到政治掛帥的影響，再度強調思想政治教育。

4.加速發展階段（1993年～迄今）：

一九九〇年代，由於配合市場經濟的發展，教育上採取一連串的改革措施，如：1993年公布了〈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

發展多種形式聯合辦學、三級管理、高校收費、「211工程」、1998年公布〈高等教育法〉及1999年公布〈面向二十一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等一連串加速改革措施。

三、學制

中國在1985年5月《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認為基礎教育（指小學到高中階段）管理歸屬地方。在學制方面，分為學前教育、基礎教育、高等教育與成人教育等階段（吳文侃、楊漢清，1999）（參見圖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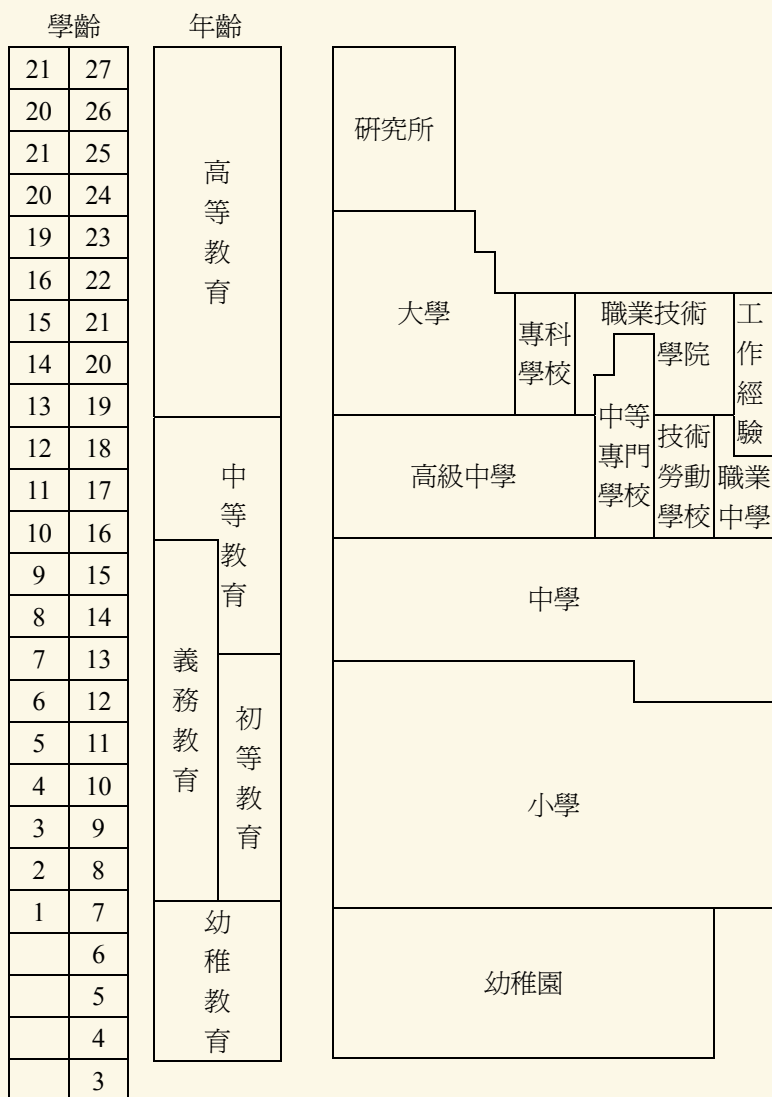


圖1 中國學制圖

註：中國小檔案

1. 總人口數：1,313,973,713人（2006年7月）
2. 土地面積：9,596,960 km²
3. GDP：2,234,133（百萬美元） GNP：每人\$7,600（2006年）
4. 識字率：90.9%
5. 各級學生人數：（2003）初等：126,543,608人 中等：97,351,826人 高等：15,186,219人
6. 教育部網站：<http://www.moe.edu.cn/>



（一）學前教育

主要以幼兒園為主，招收三至六歲學齡兒童，採公立及民辦（私立）辦學方式並行，上課形式分全日制、半日制、定時制、季節制，和寄宿制等（杜作潤，1999；王家通，1996）。為了減輕人口成長壓力，大陸自一九八〇年初實施一胎化政策，除了農村、少數民族地區及父母皆為獨生子女外，其餘一對夫婦只能有一個獨生子女，因此幼兒園的入學率高達45%以上（周愚文，1999），一般家庭（尤其是城市居民）對子女教育相當重視。

（二）基礎教育方面

中國大陸將小學、初中及高中通稱為基礎教育。在一九四九年，大陸學齡兒童入學率僅20%，全國人口中文盲比例高達80%~90%（杜作潤，1999）。因此透過各種非正規的教育途徑來掃除文盲成為施政重點，成人教育與正規教育並行、重點與非重點學校並存，成了往後五十年的大陸教育發展特色。到了一九八六年〈義務教育法〉公布，將全中國分成三區、分段實施九年義務教育（包括五至六年的小學、三至四年的初中）。一九八九年又發起了救助貧困地區失學少年基金的「希望工程」活動，到了一九九八年小學適齡兒童入學率達98.93%，在校生人數約1億4千萬人。二〇〇六年全中國小學生共一千七百二十九萬人，增加的數量主要在農村，小學學齡兒童淨入學率也高達99.27%（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07）。

至於初中階段，分普通初中與職業初中兩大類，屬義務教育範圍。到2006年底全中國九年義務教育推廣比率達98%，全國平均人民受教年限約8.5年左右（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07）。儘管如此，長期以來由於升學競爭的關係，一九八〇年曾發布了一批所謂重點中學（包括初中與高中）。一九八六年〈義務教育法〉實施之後，基本

上取消了重點與非重點的名稱，且按學區就近免試升入。但由於升學高度競爭的緣故，一般升學率較高的初中仍採入學考試，少數越區就讀或分數未能達到錄取標準的學生，近年來也可採繳費或捐資方式入學。在義務教育階段一般的初中學生免收學費，但雜費仍須由家長負擔。

至於高中階段，主要採取入學考試（如「中考」方式），學校種類包括普通高中、職業高中、普通中等專業學校（俗稱「中專」）、技工學校、成人中等專業學校及成人高中等。其中普通高中與職業高中階段職業教育的人數（包括成人教育部分）比例約5.4：4.6。

此外，普通高中自一九九〇年開始實施「畢業會考」制度，由各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統一命題與統一計分。通過之後才能進一步參加升大學的高等學校全國統一招生考試（俗稱「高考」，即大學聯考）。高考每年七月舉辦，考試科目包括語文（國文）、外語及數學為必考科目，另文史類（文科）加考歷史與政治、理工農類（理科）加考理化，（即所謂「3加X」方案）；外語院校並加考英語（外語）口試或聽力測驗（周愚文等，民88）。考前每位考生填寫高考志願時可針對四檔（批）高校，包括：重點高校，一般高校，大專，及高職（屬高等教育階段的職業教育）等四類梯次的招生學校。考生針對四個梯次的學校，在每個梯次中選擇一個學校，每校填四個專業（或科系），做為高考志願。另外，由於許多重點大學是面對全大陸招生，因此各省分配到的招生名額不一，經常同一個學校的同一科系，在面對各省錄取的學生中出現高考分數不一的情形，此舉有平衡區域、重視地區差異之效。

大陸的高考制度同樣的也過幾次變革，例如：文革期間（一九六六~七六年）廢除高考制度，改為「（工作）單位推薦，（



高等)學校審查錄取」的招生方式,導致了大學水準大幅下降(周祝瑛,1999)。到了一九七七年恢復高考制度之後,一九七八年恢復了研究所招生,設立重點學校,重新對外國際交流等措施。一九八〇年通過學位條例,自此大學及其以上的畢業生可同時獲取「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文憑)兩項證明,前者由大學校長署名,代表學生的「學習歷程」,後者由大學的「學位評定委員會主席」簽字,代表「榮譽」,但並非每位畢業生都可得到(楊景堯,2001)。

(三) 高等教育

此階段分為專科、本科(大學部)及研究生教育三階段,修業年限專科二年、本科四年到五年,研究生三~五年不等。在一九九七年以前,實施「包學費、包分配」制度,高等學校和中等專校的學生上學享有公費,畢業時由政府分發工作。不過到了一九九七年以後,大陸全面實施「供需見面,雙向選擇」的自主擇業制度,大學生上學需繳學費,畢業就業需事先與用人單位接洽,再由學校分發。值得一提的是大陸高等教育除了全國普通(正規)高校(包括四年制的大學、學院與兩年制的專科);尚包括高等專科學校和職業技術學院(以兩年制的專科為主,又稱高職)。而設有研究生教育的機構除了高等學校外,另外還有許多科研(研究)機構(如:中國科學院)也可培養研究生(張力,2000)。

(四) 成人教育

除了上述正規的教育體制度外,成人教育制度也是大陸學制度的重要一環;在農村地區一般由普通中、小學附設成人教育,如:農民夜校等。在城鎮,則由普通高校附設幹部專修科,師資本專科、夜大學、函授學校等。其中的廣播電視大學直屬大陸「教育部」,自一九八〇年中期開辦以來,已培育數千萬人。值得一提的是,成人教育也可

取得學歷,一般分為「正規學歷」與「非正規學歷」教育兩方面,前者包括各類型的業餘(part-time)學習方式及成人學校。後者則是透過各種國家檢定考試方式,如:自學考試(同等學歷考試)、國家文憑考試等形式進行。

四、教育改革

(一) 大陸基礎教育改革

綜觀近十餘年來,大陸地區小學教育改革政策,包括進行教育管理體制改革、普及九年義務教育、推動素質教育、實施新課程、加強西部地區小學教育、以及加強小學德育工作等(林新發、王秀玲,2005)。

首先,在教育行政方面,1985年發布《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實行基礎教育由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的原則」由縣、鄉兩級政府辦理中小學為主。其次基礎教育法制化發展,連續發布一連串相關法案,包括198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將義務教育延長為九年,1993年《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明確基礎教育的發展方向和基本方針。同年又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對教師的權利、義務、資格和任用、養成和培訓,以及對教師的考核、獎勵、待遇等法律權益作出明確規定。1999年初又制定《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強調「科教興國」政策。同年6月,又發布《關於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改善以往以升學考試,學校教育與生活脫節的情形,重視學生的均衡發展。

在推動義務教育與素質教育的同時,2001年6月公布《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展開中國自1949年以來基礎教育的第八次課程改革。它從保障每一個人的「學習權」,推出「三級課程管理」政策,針對以往應試教育的弊端提示一整套推進大眾



主義教育的改革方略，包括強化品德教育，關注人文素養，重視媒體教育，確立兩種課程等。值得一提的是，這次課程改革確立兩種課程學科課程與綜合實踐活動，期能改造學習方式，發展學生個性；擁有知識與經驗。這次課程改革力圖實現三大轉型：課程政策從「集權」到「放權」的轉型；課程範式從「科學中心主義課程」到「社會建構中心課程」的轉型；教學規範從「傳遞中心教學」到「探究中心教學」的轉型（鍾啟泉，2005）。

經過近幾年的實施至2005年秋季，全國所有小學和初中起始年級學生全部進入新課程，課程改革正在給基礎教育帶來相當大的變化。但過程中也出現各級教師配合不足的情形，因此自2007年起，中國各師範院校的師資培育課程將重新修正，這一改革包括頒布《教師專業標準和課程標準》，更新課程結構和內容，形成新的課程體系，建立教師教育質量評估制度等。其中，新的教師專業標準和課程標準在於要求教師尊重孩子的學習權、與學生平等地對話等，尤其目前中國已建開放型教師培訓模式，允許所有有資格的高等院校設教育學院或教師教育學院培養教師，達到規定的教師教育課程學分和標準，便可獲得教師教育畢業證書和相應的學位（如台灣的師資培育多元化）。因此，新課程改革將繼續帶來教材、教法、學法等方面的根本轉變。不過經過六年新課程改革的「行政推動」，其中存在不少問題，急需解決，包括：城鄉與地區之間的差異、中小學階段之間的差異、課程實施資源不足和配套措施問題、對課程功能結構、內容、實施看法歧異及對課程評鑑看法歧異等問題（林新發、王秀玲，2005）。

（二）大陸高等教育改革

自一九八〇年代以來，隨著大陸勞動市場的改革開放，教育體制的調整遠遠不及經

濟體制改革的步伐。由於中國從控制型的計畫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當中，涉及到整個社會型態、經濟體制、管理體制與方法，以及人民觀念、思想、生活方式的重大變革，因此對高等教育產生很大的衝擊。例如：過去的高等教育一切都納入國家計畫之內，辦學體制為國有化、領導體制多頭馬車。而政府對高等學校更是高度管理，使得在教學與研究方面與社會隔絕（楊廣德，1998）。因此到了一九八五年公布「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的文件，提出：

- 1.改革高等教育制度，減少政府對高等教育過度管理，擴大高等教育的辦學自主，以提升回應社會需求的能力。
- 2.改變過去由中央政府計畫招生及畢業生分配制度。然而大學真正開始改變的要到一九九〇年代市場經濟下的挑戰，如教育行政單位（教育部、中央各部會以及省市地方政府之間），對於高校管理角色劃分不明確，造成學校辦學效能不佳的情況。於是1993年公布「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明確指出高等教育必須隨著社會市場經濟體制和政治、科技體制改革的需要而調整。

具體而言，就教育的目標與功能來看，如何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高教體系，如何加強大學生的德育工作（指思想政治教育），成為各高校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從教育法令與規範而言，一九九五年的教育法及一九九九年的高等教育法，試圖以法律規範教育改革的落實。在大學人力的培育與規劃議題上，針對過去統一招生與統一畢業分配的制度進行改革，在就業市場上重視僱主員工的雙向選擇，及重新調整大學科系及課程等。為了提高高等教育資源的效率，鼓勵各大學進行



產、學、研三方面的聯合辦學形式。在提升高等教育素質上，引進校長負責制，管理權力下放。最後，為了適應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體制的人才需求，改變過去封閉辦學的形式，在管理體制進行大學整併、引進市場競爭機制，鼓勵向各界籌措經費與進行院系調整等工作（Pepper, 1996）。

除了上述改革外，大陸高等教育目前尚推動如「建設一流大學」、「21世紀的中國高等教育」以及研議「WTO對中國高等教育影響」等議題（鍾宜興，2002）：

- 1.建設一流大學，提出211工程與985計劃，透過重點經費補助，希望在全中國建設若干所具有世界先進水準的一流大學。
- 2.規劃21世紀的中國高等教育藍圖，面對21世紀以知識經濟為主導的社會轉型，如何進行中國社會的全面轉型轉，建立以知識經濟為主導，以高科技（廣義的）為核心，以創新為動力的社會，提出中國高等教育面向21世紀改革與發展的方向。尤其為適應經濟全球化趨勢和中國加入WTO的需要，提出高等教育質量提升和強化國際意識等規劃。

五、教改評論

綜觀上述中國的教育改革及問題，不難發現其中錯綜複雜及牽連廣泛，並且息息相關，可說是無法獨立於中國社會大環境之外。例如：近二十年來相關教育法規，政策甚至重大教育改革，大多是為了因應大陸由計畫經濟轉軌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無論基礎教育或高等教育改革趨勢，大多是為了解決當前中國社會在面臨時代潮流和世界經濟發展中所遭遇到的新挑戰，尤其迫切需要解決全面提升人民素質等問題。其中對小學教育發展和普及影響最大的為《義

務教育法》，而當前正在全面推行的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則是關係到全體中小學師生的切身問題。迄今中國教育改革目標仍無法擺脫促進經濟發展及宏觀調控政策的限制，至於在實施策略和作法上則仍然難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機制。因此，教育的主體性仍然受限。

此外，近年來中小學教育改革的重點，大多是針對為減輕高考二十年之後所造成的「應試教育」（升學考試壓力）而來。其中包括：改革大中小學的課程與教材，辦理小學免試升初中、停辦重點初中、改進各級考試制度、和檢討高考制度等因應措施（周恩等，2000）。同時，自一九九八年以來中國大量擴充大學招生名額，尤其計畫到2010年，大學生的毛入學率達15%，希望達到高等教育的大眾化階段，藉以學生減輕升學壓力，舒緩「應試教育」。另外，也包括打破過去計畫經濟時代國家壟斷、政府包辦教育的情況，重新開放私立教育，重新發展社會資源，以促進教育的多元化和多樣化，並不斷向地方下放教育權力，實施以促進教育的地方化等措施。

總之，中國大陸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人民生活與社會水準已有相當的進展。進入二十一世紀知識經濟的時代，全球化競爭趨勢增強，特別是加入世貿組織（WTO）等國際組織，帶給大陸嚴峻挑戰，大陸進行教育改革自有迫切需要，惟在改革過程中造成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利益糾結、地區差異、貧富不均、教育機會不均等、及有關配套措施的不足，產生不少問題，值得重視。

此外，就整體發展而言，中國教育在硬體上的全面且快速提升，基本上已帶動各部分的鬆綁與調整。但在教育的現代化思想與觀念上，卻常因求速效，導致急功近利的政策，而忽略過程中人文的陶冶與素質提升，尤其在批判思考、適應能力、與創新精神等



方面仍顯不足，也無法能速成。而創造力最能發揮的條件之一是重視民主、強調多元與尊重，中國大陸的教育改革恐怕還是不能忽

略自五四運動以來尚未完成的理想，包括教育民主化、重視兒童性向與個性、崇尚學術自由、大學自主等根本之道。

參考文獻

- 王瑞琦（1994）。中國大陸大學聯招與高教之發展。臺北：文笙。
-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07）。2006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2007年11月9日引自：
<http://202.205.177.12/edoas/website18/info29052.htm>。
- 汪學文（民68）。中共教育之理論與實際。台北：正中。
- 吳文侃、楊漢清（1999）。比較教育學。北京市：人民。
- 杜作潤（主編）（1999）。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制度。香港：牛津出版社。
- 林新發、王秀玲（2005）。中國大陸小學教育改革政策：問題與評析。臺北師範學院學報，18（1），1-28。
- 周愚文、黃烈修、高健民（2000）。中國大陸升學競爭研究。收於亞洲儒家文化圈（地區）升學競爭問題比較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26-27）。臺北：臺灣師範大學。
- 周愚文、黃烈修、高建民（民88）。大陸教育。台北：商鼎。
- 周祝瑛（1999）。大陸高等教育問題研究-兼論台灣相關議題。臺北：師大書苑。
- 周祝瑛（1988）。中共高等教育改革：1977-1984。臺北：私立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
- 周祝瑛（2002）。留學大陸Must Know。臺北：正中。
- 范利民（1996）。中共高等教育體制之取向。臺北：桂冠。
- 程介明（1992）。中國教育改革。香港：商務。
- 張力（2000）。中國教育綠皮書。北京：教育科學。
- 費正清（1994）。費正清論中國-中國新史。台北：正中。
- 楊景堯（1998）。中國大陸教育研究。臺北：師大書苑。
- 楊景堯（2001）。大陸大學入學考試改革的思考。教育博覽家，110，42-43。
- 楊廣德（1998）。轉變觀念、深化改革、迎接挑戰。收於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兩岸大學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福建：廈門大學。
- 鍾啟泉（2005）。中國課改：挑戰與反思。比較教育研究，12期。（北京）2007年11月9日，引自：
http://www.yxjchedu.com/jiao_yu_li_lun/li_lun_lian_jie/tiaozhan_yu_fansi_2.htm。
- 鍾宜興（2002）。大陸教育現況分析與加入WTO後的因應策略 北京、武漢和廣州三地參訪報告。2007年6月10日，取自：<http://www.ced.ncnu.edu.tw/menu-6/1/documents/910930report.doc>
- 顧明遠（2004）。論蘇聯教育理論對中國教育的影響。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期。
- Hawkins, J. (1984). 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ew York: Praeger.
- Pepper, S. (1996). Radicalism and education reform in 20th-century China: The search for an ideal development mode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yhoe, Ruth (1989). China's universities and the open door. N.Y.: M.E. Sharpe.